



剖析、辨析与明晰

——舆论及舆论学的解读思路

卢毅刚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剖析、辨析与明晰

——舆论及舆论学的解读思路

卢毅刚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剖析、辨析与明晰：舆论及舆论学的解读思路 / 卢毅刚编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1
ISBN 978 - 7 - 5203 - 3727 - 4

I. ①剖… II. ①卢… III. ①舆论—作用—社会保障制度—
研究—中国 IV. ①C912. 63②D63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545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闫萃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51 千字
定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从认识舆论到认知舆论学	(1)
第一节 舆论——人类社会形成后的必然产物	(2)
第二节 舆论学——从概念形成到科学理论	(10)
第三节 目的、方法、意义——舆论学研究该如何“进场”	(16)
第二章 舆论——拥有多种性征的意识综合体	(23)
第一节 不同社会形态下的舆论	(23)
第二节 多维要素组合的舆论	(26)
第三节 “场合”“背景”因素下的舆论差异	(36)
第三章 剖析——舆论的社会心理因素之一:认知	(47)
第一节 以认知为起点的舆论意见	(48)
第二节 认知缺失下的舆论意见	(56)
第四章 剖析——舆论的社会心理因素之二:态度	(61)
第一节 态度及其稳定性——舆论的内核形成	(62)
第二节 态度偏差——舆论意见的多元化	(64)
第三节 内驱力的形成——舆论行为得以释放的心理准备	(67)
第五章 剖析——舆论的社会心理因素之三:情感	(88)
第一节 舆论中情感与情感诉求存在的理论印证	(88)
第二节 舆论中情绪出现的偶然与必然	(94)
第三节 以情感为支点的舆情分析	(96)

第六章 辨析——舆情的基本判断:舆论的表现形态	(101)
第一节 基于表意环境的形态判定	(102)
第二节 基于表达形式的形态判定	(106)
第七章 辨析——舆情“主阵地”:网络舆论	(114)
第一节 从概念到传播——网络舆论综述	(115)
第二节 分散与融合——网络舆论特征	(126)
第三节 观念与逻辑——网络舆情判研	(135)
第八章 辨析——舆情呈现端口:舆论与传媒的互动	(150)
第一节 嵌套性平台——舆论与传媒的关系	(150)
第二节 呈现与助力——传媒在舆论传播中的功效	(158)
第三节 传媒变革下的舆论发展态势	(167)
第九章 明晰——舆论的价值体现:舆论监督	(174)
第一节 社会监督的必然要求——舆论监督的动因	(174)
第二节 合理的方式、理智的行动——舆论监督的模式	(178)
第三节 辩证的认识——舆论监督的阶段性	(180)
第十章 明晰——舆论的自身要求:舆论引导	(185)
第一节 舆论形成后的内在引导需求	(185)
第二节 舆论引导中的关系因素	(198)
第三节 舆论引导的外部因素——传媒引导	(208)
第四节 舆论引导中的“重头戏”——网络舆论引导	(213)
第十一章 明晰——科学方法的使用:舆论学研究方法分析	(218)
第一节 定量研究在舆论研究中的应用	(218)
第二节 定性研究在舆论研究中的应用	(227)
第三节 混合研究法在舆论研究中的应用	(233)
参考文献	(242)
后 记	(246)

第一章

从认识舆论到认知舆论学

现代生活中，“舆论”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作为一种常见但又复杂的社会现象，自人类诞生之日起，舆论就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延续至今，遍布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只不过，当时代的步伐进入 21 世纪、进入高科技和先进的文明社会时，人们对舆论的认知、理解和掌控都比前人有了更为系统性、更为理性和更为科学性的研究。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说：“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① 这种革命就是舆论所引发的强大社会作用力。在李普曼的眼中，舆论之重要性，不亚于影响一个国家正常运作与健康发展的物质条件。其实，自古以来，人们就已经非常重视舆论所起的作用，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论断，一语道破了权力机关不了解舆论，不尊重民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无法从事国家统治和管理工作的，也无从认识民众各种变化的心态和社会中汹涌的暗流。

那么，到底什么是“舆论”？“舆论学”又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为什么很多社会热点事件出现时，国家和社会管理阶层都要深入民间，捕捉民情？要想解开这些疑问，我们必须回到汉字出现以前的那个时代，从舆论产生的源头追溯舆论发展变化的脚步，解析舆论，掌握舆论传播的规律。

^① 参见 [美] 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 页。

第一节 舆论——人类社会形成后的必然产物

舆论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言论。只要有人群的出现，就会有舆论的出现。从现有的史料中，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人类最初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表达的心声是否有舆论的概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舆论是社会的产物，是当人群有了一定的生产关系、思想观念，集合成共同意志时形成的。

一 起源——社会性塑造下的舆论意识萌芽

(一) 原始社会形态

原始社会处于人类的幼童时期，那时的人们经常遭受着饥饿、寒冷、猛兽与自然灾害的威胁，整日里为了“能活下来”与大自然做着艰辛的斗争。结群而居，结群而劳，结群而议，是先民们最好的生存方式。原始人共同劳动、共同协作的关系构成了最初的社会，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和行为举止相互取得联系，获取信息。在这样的群体生活中，先人们几乎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尽管每位成员都有各自独立的性格特征和思维意识，不过在生存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是那么渺小，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借助群策群力抵御外侵，不得不用统一的意志唤起民众。

原始社会人们群居的环境，为原始舆论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通过信号与语言的传播，聚集在一起的先人们可以通过自由意见的表达寻找谋生的出路，个人意见的相互碰撞中，一些人不得不表示自己的意见或者听从别人的意见，这可以说是舆论形成过程中最自然的一种状态。原始社会在一个部落中，人数的多寡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较之于现在人们的群居性，那个时候人们信息传播的范围相对来说还很狭小，人际关系的交往多局限在部落内部，使舆论的传播具有区域性、独立性的特征，对家庭和部落内部的生活产生约束力，并保证和调整着氏族部落有序的顺序，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在其著作《文明与野蛮》中认为的，在初民社会里，虽无宪法，无牢狱，无天启之宗教，却能维

持常态和平，唯一最大的原因便是舆论。^①

原始时代舆论的内容较为单一，多围绕着氏族成员的生产斗争展开，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及其低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处于蒙昧时期，人们对大自然的恐惧和无奈，使人们需要一种精神和意志，加强成员之间的紧密团结，相互扶持，维持部落现有的生存状态。某种程度上，原始舆论扮演着法庭的角色，判定一个人行为的合理性。

原始社会前期是人类社会最为“祥和”的时期，人们长期进行采集狩猎，过着平均分配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和平生活，面对着生活的艰难和生存的威胁，先人们越来越渴望在一位杰出的英勇神武的氏族首领的带领下，过上安定祥和的日子。于是，氏族成员们被召集在一起参加议事会，公共推选出合适的人选作为本部落的首领，可以说，这是最早的采用舆论管理社会的一种民主制度形式，并且能被推选出来作为部落首领的，都是些德行和威望很高的领袖式人物，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像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关于“尧传位给舜”的传说和“大禹治水”的传说，就很好地证明了原始社会人们对英雄氏族领袖的歌颂和赞扬，类似的还有女娲补天、伏羲立卦、共工撞山的传说等。由于原始社会是人类的洪荒时期，人们为了解答人类诞生的谜题和表达对历史的追求，很多的事件都是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了下来，使神话传说成为那个时期主要的舆论形态。作为氏族首领，为了能够更好地得到人们的拥护，了解民情，广开言路，都很重视采纳成员的意见。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文集《尚书》是一部反映原始社会舆论活动和舆论见解的典籍，里面记录了氏族社会我国经济、政治、哲学和文艺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成书于西周的《洪范》曾有“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重天子之光”“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②的描述，说的是庶民的话对天子是大有好处的，天子一旦遇到疑虑的事情，都要征求卿士和庶人的意见。《吕氏春秋·不苟论》也记载了一些氏族首领鼓励成员建言献策的举动：“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

① 参见[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吕叔湘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8页。

② 参见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嗔之。”由此可以推断，在氏族社会，氏族首领们已经开始注重普通民众的言论，至少西周以及表示舆论这种事物的概念用的是“谋及庶人”“庶人之言”了。

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与部落在交往过程中，因利益产生了诸多的矛盾，血族复仇和掠夺财富的战争舆论成为那个时期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国神话传说中共工和蚩尤的战争，黄帝和蚩尤的战争、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正是原始社会里掠夺性战争极其频繁的反映。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是家族式群居，相互之间没有纯粹的利益，以生同存、死同亡的精神概念维系部落生活，一旦氏族内的成员遭遇到外族的杀害或部落遭到外族的入侵，个人的屈辱、部落的凌辱就会点燃复仇的火焰，成为人人遵奉的舆论。这个时候，勇武强悍的勇士、忠肝义胆的战士在战争中成为人们崇拜的英雄，世界文学名著《荷马史诗》就为我们描述了原始社会英雄时代的一幅全景，塑造了一系列性格突出、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如残暴而温厚的阿喀琉斯、温柔贤良的墨涅拉俄斯、敦厚而的埃阿斯、勇敢而又精细的赫克托尔、充满野心的阿伽门农等等。他们都是些拥有大智慧、大无畏精神、充满斗志和雄心的人物，敢于挑战命运和诸神的摆布，执着地追求自己的宏大目标，永不言败。在古希腊民族舆论看来，英雄史诗用神奇的笔调突出了英雄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歌颂了那些英雄的子孙们。战争是残酷的，当我们为它披上英雄的战衣时，人们往往忽略了战争带来的伤痛和苦难。原始社会这时的舆论已经不仅仅是协调氏族内部平衡、博采众议的管理方式了，而成为有野心的氏族首领可以攻城略地、抢占地盘的武器和工具。

原始社会科技水平以及劳动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处于蒙昧时期的先人们，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长期生活在忧郁与恐惧之中。于是，人们迫切希望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够指导他们摆脱恐惧的束缚，缓解心理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始宗教中的巫术便孕育而成，某种程度上不仅成为原始社会的文化核心，而且还产生了巫术舆论。《尚书·洪范》中“汝则有六蓍，一曰巫比，二曰巫参，三曰巫环，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的描述，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文化中发现的含有巫术性质的遗迹、法国诺克斯洞穴里发现的野牛壁画，都证明了巫术在原始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原始社会，巫术属于自发形成的一种宗教仪式，巫术的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原始人一种逻辑思维的观念，是表达人们愿望的一种方式。

（二）古代社会形态

随着石器的发展、金属工具的出现，劳动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私有制的产生和国家的建立揭开了人类进入古代社会的篇章，使落后的、相对粗俗和低级的舆论形态步入了一个充满着血腥和斗争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古老的民族脱离了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向着文明社会逐渐过渡，舆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开始趋于多样化、复杂化。

1. 阶级舆论

当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产品剩余的时候，原始社会原有的生产关系走向了瓦解，从社会内部分化出来的氏族贵族，不断加剧了与其他成员的贫富差距，债务奴隶、战俘奴隶的增多，使原始社会结束了共同生产、平均分配的原始社会形态，产生了人类社会上第一个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奴隶和奴隶主。自此，人类社会进入了长达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如果说奴隶社会的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只是“会说话的工具”，那么，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则相对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权，组成了传统农业时代主要的社会成员，推动着历史进程的发展，但是，土地所有权的丧失并没有让农民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构成了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为统治阶级，他们一方面希望采用国家机器的手段控制和压迫民众，另一方面试图运用各种学说思想奴化人们的精神意志，而作为被统治阶级，深受生活和精神折磨的奴隶和农民以期通过反抗斗争寻找自由解放的出路，他们一旦反抗就必然要触及乃至颠覆社会结构，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可以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是唯一的自救途径。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年的农民领袖樊崇起义、东汉末年的张角于起义、北宋的方腊起义、明朝的李自成起义、古罗马的斯巴达起义等，都是社会底层的人们反抗压迫、反对剥削的光辉事迹。舆论在阶级关系的推动下，日益健全并融入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成为阶级斗争和国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

阶级社会统治阶级需要用思想言论来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暴力统治手段相补充的就是“钳民之口”。舆论与国家暴力相比属于软性控

制，能够诱导全社会成员接受统治阶级的领导，为了保证皇帝天子地位的不可撼动，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操控民众的社会生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们，民众稍有警觉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有镇压就会有反抗。和统治阶级对立的就是庶民、奴隶和农民反抗的舆论。这种舆论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点燃就一直没有熄灭过。《尚书·商书·汤誓》中记录了商汤伐桀时举说桀的罪状只是“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还记录了庶民斥责夏桀暴虐无度的话：“‘时日害丧，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奴隶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压迫制度，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舆论受传播范围和舆论强度的影响，力量较为弱小，产生的社会作用并不显著。到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成为一个新兴阶级的时候，舆论才在某种程度上真正地发挥了社会凝聚的作用，成为被统治阶级革命的战鼓和号角。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让大批的农民沦为农奴，由于农民在封建社会中地位的低下，在统治阶级官方史书涉及农民的资料很少，即使有也大多以贬斥和诋毁的口气，认为他们是“贱民”。反倒是从一些古代文学名著或者稗官野史中可以寻找到农民反抗的足迹，比如在《水浒传》中就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事件，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封建社会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是农民抗争最为激烈的表达方式，处于西欧封建社会时期流行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地位的农民不甘在沉默中灭亡时爆发的愤怒，很快就会感染他人加入抗争的队伍，这在那些振臂高呼、撼动统治地位阶级的起义中没有舆论是难以想象的。作为起义的发起者，最先反抗的农民总是要凭借着一定的纲领或者口号鼓动人心，获得民众支持才可能发动战争甚至颠覆政权。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的传记，文中提到的鱼腹中书“大楚兴，陈胜王”的舆论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让我们了解到早期农民起义已经开始尝试利用舆论的社会作用，制造舆论煽动民心。侯外庐先生说：“陈胜吴广的起义，其口号看起来不足称道，但是他们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口

号，是针对了帝王将相的迷信。”^① 其实，那个时期的农民可能未曾想过利用舆论与帝王抗衡，只是希望通过某种途径使农民起义披上合理化的外衣而已。在以后的农民起义中，制造舆论成为农民抗争的一条普遍路径。东汉末年农民领袖张角起义中广为传播的“太平道”和“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北宋方腊起义提出财产公有的理想：“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间，谓之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及明末李自成等贵贱、均田免粮的主张，都延续了陈胜吴广起义的手法，通过舆论传播实现农奴翻身的目的。不过，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些舆论在追求平等自由的同时大多充斥着虚幻的空想，只能在农民起义初期产生良好的社会作用，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让农民实现彻底的解放。

2. 士人舆论

我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社会民众，三教九流，有“官、民”之别，有“九儒、十丐”之分，有“丘八、臭九”之说。官僚阶层掌握着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权力，与“民”有着明显的界限。《管子·小匡》中对古代社会中什么是“民”进行了表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在《管子》所提到的四民中，“士”阶层既是古代社会国家政治的主要参与者，又是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崛起于周王室走向衰微的过程中，“大抵皆有职之人”，是各级贵族的通称，更多的是指宗法分封制度下的一个等级，处于宗法贵族等级序列的最末一等。到了春秋战国，“士”摆脱了宗教等级的束缚，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一批非宗法性的“士”崛起，成为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非常活跃的阶层。各个国家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这些士人学识渊博，各负理想，有些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积极宣传诸家学说，有些严于律己、忠君爱国。孔子就曾提出过士人的标准。《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② 这种“士”的精神，是士人们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彰显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

① 参见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② 同上书，第49页。

在古代常被作为一种精神典范。

士人是我国古代文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为了宣传和鼓吹各学派的价值观念，奴隶社会的士人以游说的形式传播各种舆论。游说，墨子认为是“行说”，就是以口头劝说的形式推销自己的意见。孔子是当时最为著名的游说家，“大树之下”“杏坛之上”都是宣讲的场所。到了孟子的时候，墨子学说、杨子学说，几乎与儒家学说成三足鼎立之势。《孟子·滕文公下》就曾言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孟子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表明那个时候各家痴迷通过游说的方式达到传文讲道的目的，游说是“适应当时物质水平而唯一能够做到的传播舆论的手段，是简单的舆论行为”。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在那个诸侯割据战火纷飞的年代，出身不同阶层的士人致力于跻身于国家政治中谋求发展，企图通过创立新学说、新思想拉近与官僚阶层的距离，适应社会变动的需要，涌现出了很多历史上有名的舆论大家，荀子、韩非子、庄子、老子、鬼谷子等都是颇有影响力的舆论领袖。这些人广收门徒、游走各国，其代表的文化思想为国家政权奴役民众精神、控制民众意识提供了思路，有些国君还礼贤下士，笑纳百家之言，招揽人才，广采民意，借助社会舆论思潮，巩固政权，谋求大统。

随着秦王朝结束了割据局面，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开始，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城镇与手工业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士大夫与农民、手工业工人、商人都成了社会下层人群。代表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舆论为了加强对下层人民的控制，不断与士人阶层的舆论发生冲突，加上农民舆论和农民起义的号角不时响起，动摇着风雨飘摇的皇权，导致封建社会士人舆论经常遭到无情的镇压，封建统治阶级舆论专政的加强。

到了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造成政治腐败，一批代表庶族地主和平民利益的官吏分流出来，反对外戚宦官的舆论一时高涨，蔚然而成“清流”。这股“清流”采用清议的手段，与“天人感应”今文经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及昏暗、肮脏的政治行为相抗衡。“舆论得到了一次极其罕见，令人怜悯而崇敬的运用，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太学生运动’，有效地抑制了宦官权利的做大，把对汉王朝的最后清算至少延长了数十

年。”《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当时的情况时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东汉时的士人大多系读书人，既有名人望族也有不少官吏，他们常在乡校、亭台聚义，闲谈时势、交流看法，著名学者兴办的私学里，学生达数千人。这种公共批评的习惯，最终成为遍及全国的风尚，遭到宦官集团的压制，被下狱、处死或流放的士人甚众。两次党锢之祸直到184年黄巾起义，统治阶级的内部纷争才告暂停，舆论稍归平静。接下来的朝代里，士人对政治和国事变得冷漠起来，人人自危的年代，士人们选择了不动感情的“犬儒式的冷漠生活，或者纵情声色，不问世事”，魏晋时期的士人们几个人聚集在一起，“不闻清谈论道之言，专丑辞嘲弄为先”（《抱朴子·疾谬篇》），清谈与玄学盛行一时，士人舆论的“浊流锄奸”的斗争性趋于衰弱，一直到明代东林党人的“聚集”，士人舆论再次发挥了作用。^①东林学派不是放逸山林的隐者，也不是闭门读书的士人，他们的讲学活动是一种结社，是为了推销观点，造成舆论。只可惜，与东汉太学运动的舆论一样，东林党人的舆论活动也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多名东林党人被诬陷先后迫害致死，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自此以后，明清的帝王时有沿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措施，大兴文字狱，镇压士人舆论。士人，这个代表着先进文化的阶层，构成了封建社会舆论的主体，他们站在舆论的前沿阵地，敢于挑战皇权，一方面显露了士人参与国家政治的热情与斗志；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士人舆论在古代社会力量发挥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对抗中，一些士人舆论反倒成了社会的靡靡之音，丧失了革命性。

二 发展——社会激变下的舆论意识强化

19世纪以来，中国在清政府的统治下进入了一个伤痛的年代。强占、逼迫、屈辱、战败、赔款、杀戮等像挥之不去的幽灵残酷地植入人民的

^① 参见刘建明《舆论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记忆中，就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中国的许多文人志士都投入到救国救民的战斗中，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让中国的国人逐渐领略到了报章舆论的威力，揭开了中国新闻媒体代表舆论、引导舆论参与政治变革的新篇章。梁启超、胡汉民、李大钊等相继撰文倡导民主，反对专制，呼吁还给民众言论自由，强调舆论对国家政治的作用。此后，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等一批优秀的报人以新闻学特有的视角研究了新闻与舆论的关系。随着大量报刊在国内的涌现，新闻舆论逐渐成为战时的利器被政党和政府广为使用，也成为监督政府监视社会的一种有效途径。至今，新闻舆论仍保持着先进的社会作用，缓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生活。不过，较之于以往的舆论形态，现时社会中的舆论环境更加复杂，尤其是网络舆论的异军突起，把普通的民众真正地推到了舆论前沿，彰显出爆发式的影响力。

第二节 舆论学——从概念形成到科学理论

一 概念的缘起

（一）我国舆论概念的形成

因字而解，舆论就是“舆人之论”。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帝王的思想正处于由“敬天”向“重民”的转化，国君和官僚阶层倾听养士和庶人的意见，重视下层人们的舆论成为当时管理国家谋求发展的一种风尚。统治阶层往往把下层民众的意思统称为“庶人之议”“庶人之谤”。“舆”字在春秋末期，指的是“车子”，后来，舆字和人连在一起使用转化为造车的人，称为舆人。《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说明春秋末期社会的人分为十等，舆人为第六等，被赋予抬轿子的人的意思，并逐渐取得了“下等人”的含义。可见在春秋末期，舆人是社会底层地位低下的普通人。

“舆人”这个词出现不久，在表达下层意见的概念中出现了与舆人相似的概念“舆人之诵”“舆人之谋”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记载：“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舆人之诵”

“舆人之谋”都是士兵车夫之类的下等人表达的意见。《国语·楚语》中曾对当时国君面临各种舆论的包围，广泛征集各种意见制定国政、发布命令做过这样的表述：“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谏、谤与诵都是表达某种意见，但是诵具有“谓箴谏之语也”，具有公正劝诫的意味。因此，当时各国国君遇到大事或者紧急情况常常听取舆人议论，广泛征求舆人意见，作为谋政的尺度。春秋时期，与“舆人”相同的还有“国人”的概念。只不过，国人往往是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财产或者敢于起来反对国君暴政的人，他们关心国家政事，了解民情，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左传·襄公五年》写道：鲁师“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郕。臧纥救郕，侵邾，败于狐骀。国人逆丧者皆髻。鲁于是乎始髻，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讲的是武仲打了败仗，遭到了国人的怨愤，痛骂他是侏儒小子，可见，国人是敢于发表意见的。此外，《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监谤故事的时候写道：“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可见，早在西周末年，就出现了平民的议论，代表的是早期市民阶层的意见，具有强大的威力，显示了民间舆论对权力机构的监督作用。

“舆论”概念的形成和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典籍《三国志·王朗传》记载的曹魏谏臣王朗在上书文帝奏疏中写道：“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此后，《梁书·武帝纪》中再次使用了“舆论”一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舆论”。舆论这个概念是由舆人之诵、舆人之谋转化而来的，都用来表示老百姓对社会大事的议论。通常我们把舆人之论和舆论理解为同义语，舆论是舆人之论的简称或缩写。在我国古代社会，晚于舆论概念，意思却相似的还有其他几种方式。比如，从六朝时，士大夫阶层进行的清议和清谈某种程度上就代表舆论，一直沿用到了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清议》中说：“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傲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在整个封建社会，人们还用“民心”“民欲”等词表达广大群中国的舆论。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古语“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都能够体现出封建社会帝王重视民众、关

注民众舆论的动向。自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以来，反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风起云涌，伴随而生的就是民主意识的崛起，受到先进文化思潮影响的许多革命家、思想家开始使用“民意”来表达舆论的含义，直到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把舆论理解为民意。何谓民意？朱执信解释道：“人民意志何以能发扬其力乎？则又当曰：有主义指导之固也……非武力，亦非金钱，乃有主义之人民意志也，即所谓民意也。”民意是人民思想、意愿、要求的外在表现，是社会舆论的主体构成，只有当民众以绝大多数的比例发出共同心声的时候，舆论才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形成民意。民意概念在近代社会的提出，是人民自我表达意见意识的提高和社会地位、政治作用提升的表现，受到社会政治势力的重视。在现代社会，只有尊重民意，了解民意，才能提出国家建设发展的正确目标，因此，民意是社会中最有威力的舆论，是人民精神的象征。

（二）西方舆论概念的形成

较之我国“舆论”概念漫长的发展，西方对舆论的解释、界定，比中国要晚许多。在西方奴隶制社会时期，拥有土地的贵族掌握着国家命脉，平民与贵族虽然矛盾激化，但是人民参与政治运作的机会微乎其微，大规模的舆论热潮较为少见，民意并不是像在中国那样受到国君和官僚阶层的重视。中世纪以后，与王权有着相似威力的神权逐渐统治着人们的肉体 and 意识，教皇成为精神领袖，与王权展开了权力的斗争。比如11世纪，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拒不承认教皇所颁开除教籍的敕令，拒绝服从，召集一些附和他的教会人员举行会议，宣布废黜教皇。没想到，教皇反过来却废黜皇帝，开除皇帝的教籍，宣布臣民效忠皇帝的誓约无效。因此，从公元9世纪一直到15世纪，西方的民众被宗教舆论所笼罩，臣服在精神崇拜和信仰的舆论旋涡中。据考证，西方古代大规模的舆论行为，就是发生在罗马统治下人们对各种宗教信仰的议论，最为突出的是“公众的声音就是上帝声音”的观念，这和中国古代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表达非常相近，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记载说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18世纪以前的数百年间。

西方舆论研究中，舆论概念的提出有着不同的版本，有学者指出，约翰·索尔兹伯里（John Salisbury）于1159年最早使用“公共舆论”这个术语，将公共舆论放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不亚于正义、自由或法律；